

**编者按:**

国学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孔子学院在各地的建立,也使世界把眼光投向中国“国学”。国学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中国和平崛起中重建,是人们关注国学的焦点。为此,《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专门组织了由中南民族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徐杰舜教授组织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叶舒宪教授、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郑仁钊博士等。在座谈会上,人类学家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就国学与人类学的关系畅谈了自己的看法,颇为别开生面,另有洞天。本刊特全文发表座谈会录音稿全文,以飨读者。

# 人 类 学 与 国 学

徐杰舜,叶舒宪,王铭铭,彭兆荣,徐新建

**摘 要:** (见编者按)

**关键词:** 人类学;国学;文化自觉

**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8233(2007)02 - 0001 - 18

## Anthropology and National Studies

*XU Jie-shun, YE Shu-xian, WANG Ming-ming,  
PENG Zhao-rong, XU Xin-jian*

**Abstract:** National Studies has become a heated topic in the academic circle in China. The establishments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many countries draw the world's attention to China's "National Studies". The focus is how the national studies can be reconstructed in the global background and the peaceful context of China. For this, the chief editor of the national studies edition of Guangming Daily organized a forum, which was hosted by Professor XU Jie-shun,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Many famous professors attended the forum, such as YE Shu-xian from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ANG Ming-ming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PENG Zhao-rong from Xiamen University; XU Xin-jian from Sichuan University and ZHEN Ren-zhao from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anthropologists aired their view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Studies and Anthropology. This journal presents the recording transcript of the forum to benefit the readers.

**Key words:** anthropology; National Studie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梁枢(《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各位好,今天我  
先来抛砖,好把徐兄的玉引出来。非常感谢各位牺牲  
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参加这个访谈,这个访谈是由光明

日报国学版主办的。国学访谈这个栏目自从2006年  
1月10日推出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非常大的关注,  
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关于人类学与国学这个问题

**收稿日期:** 2007 - 02 - 18

**作者简介:** 徐杰舜,中南民族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叶舒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彭兆荣,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新建,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也是我们一直早就想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前面徐兄与民族大学的一个老先生曾经聊过一些,里面有些不错的观点,但是都没有展开。大概好像是因为时间的原因吧,或者是准备不太充分,总之没有能展开。

徐杰舜:有些东西也是在讨论的过程中才发现的。

梁枢: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陆续认识了叶舒宪老师,叶老师也经常在我们的新浪网乾元国学博客圈上贴文章,他贴的东西我也都看到了,也是谈这个话题的。还有徐新建老师寄来的《民歌与国学》。彭兄对这一块也一直有研究,我的《口述中国》里曾经收入彭兄的《当历史违背历史的时候》,这个名字好像还是我起的。逐渐往这儿走,今天总算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碰巧你们俩(徐、彭)到北京抓个现差,徐兄是今天专门从南宁飞过来,晚上还得飞回去,非常感谢各位!今天正式的主持人是徐兄,我就说到这儿,现在请徐兄开始。

徐杰舜:我首先介绍一下在座的各位:第一位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比较文学研究室的主任,叶舒宪博士、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的文学人类学的领军人物,号称“叶帅”。第二位就是徐新建,博士、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所长。这两位一位代表北方,一位代表西方。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兼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彭兆荣,也是博士、博士生导师,是东边的一方神圣。我是南边来的,我是广西民族大学汉民族研究中心的主任,同时也是中南民族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所长,我就代表中部和南部了。(梁枢:还是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把中央民族大学的算上就是从南到北一条龙了。等会到会的还有北京大学的王铭铭教授,王铭铭教授本身就是一块牌子了。他是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的教授,也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导师。今天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小郑,你自己介绍一下吧。

郑任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博士):我叫郑任钊,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思想史室的。

梁枢:小郑是我的忘年交,也是我们国学网的网管,我们都归他管。

徐杰舜:今天出席座谈会的一共4位。自从《光明日报》国学版创刊以来我们人类学对国学十分关注,有人说是人类学对国学的挑战,我认为说挑战不妥,应该说是关注。为什么人类学要来关注国学?我认为有这样一种过程,在20世纪末的时候,我们人类学讨论最热的是人类学的本土化,为此专门在南宁召

开了一次人类学本土化的国际研讨会,当时来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类学家,包括英国、法国、美国、荷兰、西班牙等等,还有中国台湾、香港的人类学家都来了。当时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学的本土化在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人类学在中国要实现本土化要做好三个方面的事情:第一个方面就是对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进行解读,要用人类学的理论来解读;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对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进行田野调查;第三个方面是把上述两者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够实现人类学的本土化。当时我提出的对历史文献的解读,今天来说这个历史文献就是国学。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人类学界讨论的话语有了很大的变化,可以看得出来很少有人再去谈论人类学的本土化问题,而是强调人类学的中国话语,有一次我和叶兄谈到这个问题,他希望我们能组织一次讨论,坐下来把中国话语的问题好好讨论清楚,不要一天到晚都是跟在西方后面走。那么人类学的中国话语,谁也不能绕过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的重读。原来是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读,现在我觉得是一种重读。为什么要说重读?中国国学基础的东西可以说两千年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在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这一段历史时期值得特别关注,这一段历史绝对时间有1800年,秦统一中国后至今也不过2000多年,那1800年所积累的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基本上都是历史文献,国学核心的东西就在这里。无论后来讲什么经、史、子、集都是来自六部,六部后来变成四部。我们进行重读就是要将我们中国文化传统的东西、内核的东西搞清楚。而恰恰是20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这个改革开放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西方的各种理论、各种思潮、各种思想都到中国来,我觉得算是全部展演了一遍。展演了一遍的结果是什么呢?展演的结果是我们发现它们好像都不能解决我们中国的问题,甚至不能解决西方世界的问题。所以他们要到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去找武器啊,找解决方法。尤其是最近五年,这个世界打得天昏地暗,到处都在爆炸,但是回到中国传统的文献中,最重要的就是强调“和”的问题,“和为贵”也好,“和合”也好,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核心东西。我们说西方的理论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连西方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这不是我们自己说的,是西方学者的观点。前不久王铭铭请了一个法国的学者,他就谈到西方学者现在关注的是“第三面镜子”或者说“第二面镜子”,就是中国,如何从中国找到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或者精神武器。我们今天开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探讨一下人类学与国学的关系。《光明日报》国学版

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使我们可以坐在一起讨论人类学与国学的关系,那么,人类学与国学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早在20世纪初传统派与反传统派的争论当中就有一部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当时就有老的国学家出来说要注意文化学、人类学这些学科对国学的关系问题。现在是21世纪初了,不仅有传统的文化在起作用,而且人类学的理论对国学也有影响,如何影响?今天就想请大家畅所欲言,好好地把我们梁兄所提供的平台占领一下,或者说日后再扩大一下。我先讲这些,作为一个开场白。

叶舒宪:那我接着徐兄的话说。人类学关注国学,反过来国学也需要一个人类学视野,这就像从两个方向挖隧道,如果一旦挖通了,对二者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境界。实际上这两个东西是相通的,从哪里通呢?从20世纪早期西学东渐以来做国学的人大都有人类学的视野。比如郭沫若、闻一多、顾颉刚、傅斯年,他们都是留洋归来,对考古学、人种学都有积累。傅斯年是侧重考古学,主持安阳殷墟发掘之类的都是他们。今天讲到国学似乎就与人类学没有关系了?主要是因为这个学科在中国没有合法化,解放前的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有人类学专业、人类学系。(梁枢:国学也不合法)国学虽然也有不合法的受到批判的时候,但是保留国粹的主张一直都是存在的,名目还是存在的。人类学主要是在国家的教育体制中没有合法性,今天虽然好一些,但是还是没有,从学校的学科建制就可以看出来,很少有人类学的本科专业。这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和国际高等教育之间一个很大的落差,在西方国家,乃至亚洲的日本、韩国,不管叫做人类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也好,都是非常普及的一个学问。国学与人类学的结合,不仅仅是一个解读文献的问题,实际上是把国学原有的本土封闭的视野拓宽了,拓展到了比较文化视野中的国学。这也是20世纪以来的一个学术大趋势吧。清朝及以前的人做国学就是注经,没有什么别的出路,注经的做法中非但外国的材料,就是少数民族,我们所称的蛮、夷、戎、狄的材料都是一概不能用的。除了儒家的经典以外都被看成旁门左道,所以这种国学在两千多年的建构过程中路子是越走越窄,因为它是封闭的。20世纪的学问,不说人类学,也是有了比较文化的知识背景。从世界文化的视野再看国学,实际上就是已经有了比较文化的这种维度,它和文化人类学(又称“比较文化”)在方法在学理上应该是相通的。那么为什么要强调人类学和国学结合的意义呢?是因为在所有人文学科之中没有一个学科像人类学这样具有整合的意义。文、史、哲、政、经、法之类都被整合在文

化里面了。这些学科当然都很必要,但是像文化人类学这样具有强大的学科穿透力、辐射力的还没有。人类学可以拓宽国学的境界,我们不可能回到清人乾嘉学派的治学老路上去,或者回到章太炎、刘师培所主张的国粹学派的国学,这都不可能。今天的国学应该是今天的知识条件下的再创造,所以人类学应该算是最宝贵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资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做这个工作就是闻一多的传人,我们文学人类学会的前任会长萧兵先生。他1991年的《楚辞的文化破译》基本上就是把传统的国学研究的局面拓展到了世界文化的视野之中,特别是提出了环太平洋文化因子——如太阳鸟神话在环太平洋地区的表现等。他根据《天问》的“阳离”神话解释“离骚”两个字,离这边从佳,就是鸟,他将《离骚》解释为“太阳神鸟的悲歌”,让人耳目一新。整个这种考证的方法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我们这一代学文史的读书人几乎没有不知道萧兵的。他的这种做法不敢说是挑战,但是冒犯了传统国学的“家法”。把外国的、外民族的材料拿来解释经典,在20世纪以前是少有先例的,这就在学院派内部引发争论。

(徐杰舜:他是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吧?)

叶舒宪:20世纪80年代是以论文为主。我和萧兵、王建辉先生共同主持的那一套“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湖北人民出版社)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一共出版了8种,其中萧兵参加的有4部(《楚辞》、《老子》、《中庸》、《山海经》),还有臧克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写《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王子今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史记的文化发掘》等。先后有3部获中国图书奖,但是在国学圈子里还是有争议。为什么从出版的角度受到重视,但是在学界还有很大的阻力呢?就是因为做传统国学的人不关注人类学,认为西方的什么荣格、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们还是要守住文献、考据这些“家法”传承的领域,我们觉得这是今天国学发展的悲哀。就算今人想要回到清人治学的路子,也做不过清人,甚至连十分之一都做不到。看看清末学人,尤其是小学家(如孙诒让等)所做的学问,文献的功夫是今人根本无法企及的。自1906废除了科举之后,取消了大中小学的读经课,国学就被釜底抽薪了。今天虽然有孟母堂之类的新私塾组织孩子念经典,当然在某些方面有可能会热闹一时,但是要想恢复传统的国学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国学的核心根本不是讲知识论的东西,国学的核心是培养人格的(“心学”)。孔子为什么认为颜回是最好的学生呢?他有什么专业知识呢?

只是因为他在陋巷潜心修道,不改其乐,那是一种高超的人格境界,但这样的人如果在今天,恐怕连高考都不能通过。今天的语境下也丧失了培育这种人格的条件,所以今天的局面在表面上非常热闹,到处祭孔,满街人都议论《论语》,但是人们忽略的是:国学的魂在何种意义上能够续上。我看实际上续不上。为什么续不上?因为20世纪几次文化革命——新文化运动一次、文化大革命一次、改革开放30年是更厉害的一次,在我看来这是第三次文化革命,实际上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完全砍断了。哪怕建立一万个孔子学院,这个根也续不上了,为什么呢?简单地说,国学要培养君子人格,可今天的学校完全丧失了这种功能。按照全盘西化的学科专业划分,以培养职业的谋生技能为主,还能培养出君子吗?国学也被新儒家倡导,看是不是能让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接上轨,余英时等的这种呼应韦伯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国学中断了之后的回光返照。国学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延续呢?主要是它的研究方法,即文史考据方法。经学家们对古代经典的研究主要局限在语言文字的诠释上。古代的经和史这类书,从人类学来看是很宝贵的。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化从上古起一直到近代(清末)每一年甚至每一月都记录下来的,这是了不得的事情。跟印度一比就太明显了,印度没有一部史书,《大唐西域记》在中国只是一个游记,但拿到印度去那就是第一手的历史,因为他们没有史书系统。他们不记,是因为世界观和时间观不一样,他们认为时间是循环的。我们的这些历史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田野”。人类学倡导到异文化中去做田野作业,不是要一定有仪式、有个跳神的才算是田野,我们这一笔文献资料本身就是很好的古代文化的田野。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把它当作田野。其实这是汉语书写文化留下来的最丰富的田野,那里面可以驰骋的空间太大了。因为从前没有从人类学角度去开垦、关照,经典文献在我们看来就像有待考察的矿藏。萧兵先生研究面非常广阔、伸缩性极强,往往从一个字到一种文化现象,乃至跨越地域和民族界限的文化圈。我们希望通过培养研究生的方式将这种新国学传统延续下去。就是闻一多、郑振铎他们开创的传统。郑振铎是我们文学所的老所长,当初就是因为读了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受到启发,意识到原来国学还可以有另一种做法。他写了一篇《汤祷篇》,后来出了单行本,被周予同先生称为中国史学的新一派。可惜他没有做下去,这个新国学传统在1949年以后就断了。要延续这个传统,我想人类学和国学的方法对接能够让考据法提高一个境界。因为考古发掘的东西和新

发现的传世文物(包括汉语和非汉语的文献,实物和图像资料)是前人所看不到的。按照20世纪人类学的内部划分,考古学是它的下属学科。中国境内考古出土的东西(三星堆文化、红山文化等)和新发现的东西(如西夏的碑志、湖南的女书、古藏文骨刻、敦煌文献)等是过去的国学所没有的资料。那么这些东西有什么价值呢?文字的书写只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三千年之前殷商时代之前,没有文字的时候靠什么去认识呢?清代国学大师也对此望尘莫及。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就因为发现商代甲骨文,那么商代再往上靠什么去探索?汉字书写的中原文化区以外历史真相靠什么去认识?考古所提供的实物证据非同小可。国学视野更新的希望就在这里——考古学提供的线索,再加多民族的民俗文化线索。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复杂性,表现在今天就是多民族文化的融合。我们姑且就认可是56个民族,但实际上远远不只,如果从人类学意义上去识别界定,就复杂了(一个台湾的高山族里面可以划分出12个不同的族群)。族群的识别、各民族的文化特质,各民族之间的互动,留在今天许多地域的草根的文化,我们把它叫做第三重证据。它们应该和汉字书写记录下来的文献中的历史形成一个互动。这就是今天的国学在方法上能够借助人类学视野,提升一个境界,甚至做到清人所做不到的东西。

梁枢:如同孔子说的礼失求诸野。

叶舒宪:是的。除了探求中央王权文化的“礼”的民间传承,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还原被单一视角的汉语书写的文本遮蔽背后的文化真面目。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比如说党项人的西夏文化,在宋朝时能够占据整个西部,和汉族政权以及辽国三足鼎立,那是相当辉煌的。2006年11月我们在兰州开文学人类学会议的时候,有位蔡铁鹰老师提出近十年《西游记》研究的视野西移。按说《西游记》属于四大名著,是国学的一个部分,怎么会研究到西夏去了呢?原来敦煌的东千佛洞和榆林窟的西夏壁画中就有孙悟空牵马并手搭凉棚,和唐僧一起仰望着观音的画像,这是相当于宋代的党项人的图像叙事,比吴承恩《西游记》的汉字叙事早了300年。也就是说这部小说绝不是汉族人在文本上创造出来的,而是来源于西夏时代的藏羌文化区那边流传的民间叙事。如果到当地(今甘肃瓜州县)去看,当地老百姓都能讲出唐僧在当地收服了一个叫石磐陀的——或许就是孙悟空的原型——然后如何过关去取经,路过什么葫芦河啊,火焰山啊,当地都能落实到实地的。这样的一种视野过去是没有的,汉族的书写文献里没有。为什么

西域边地那里有?因为,第一,远在沙漠区域里,文化革命没有破坏掉。那些石窟壁画,一千多年了还保存着,虽然色彩有点脱落了,但画面还能看清楚。第二,当地是唐僧取经经过的地方,本土的民间传说、故事以口传方式存留至今。可惜传统国学不关注汉族以外的东西。孙悟空来自哪里呢?古羌-藏族群把猴子当作神,叫做“神祖”,季羨林当年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就是从印度史诗的神猴哈努曼传过来的,是那么简单吗?如果了解了当时西域文化的背景就会发现猴子在那里也是神圣的。而汉族文献中的猴,从唐传奇以前都是一个形象——善淫,以《白猿传》为代表的。孙悟空这样一个不近女色的形象绝不是汉族本土文化的产物,是外来的。从哪里来?离不开西夏文化,就是古代的羌-藏族群集团。印度也有神猴,但是从印度到中国并不是直接的,就是取经路也是一站一站走过来的,所以就要把河西走廊的文化交流搞清楚,孙悟空猴行者形象才能得到透彻理解。可见,人类学所提供的这种角度是其他的学科所欠缺的,而且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意义。这样一来,国学研究到了今天,在王国维二重证据以外,有了多民族文化第三重,考古提供的实物的、图像的第四重。四重证据的视野和清人的一重视野,就光是注经也完全呈现为两个世界了。

这种做法,由于一般学科中人的知识背景限制,很难普及。学中文的就是学中文,学历史的就学历史,学人类学的对国学、古代文献又不很熟悉,所以对接不上。今天的教育制度实际上是不利于学术发展和创新的。很多地方现在建立国学院,厦门大学好像也建立了国学院,但如果国学院还是仅仅拿着孔孟的经去念,还是有问题的。

徐杰舜:叶老师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的国学有几千年的传统,按照几千年的传统培养,肯定是我们儒家的那种面貌,就是念经,锤炼人格、温良恭俭让、培养君子。但是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是完全从西方移植来的,可以说现代教育制度跟我们的国学没有任何联系。不要说根,连根毛都没有。所以接着叶兄讲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就人类学与国学的对接问题再谈一谈。

徐新建:关于人类学与国学,舒宪用了一个比喻,好像挖隧道一般。原来是各走各的,现在则有可能交汇、有可能接通、也有可能错位。这样来看呢,彼此可以作为两个参照系来相互比较。

首先我声明一下,国学是不好随便讲的。我虽然被列入“国学网”,但自己不敢称国学研究者,所以还没敢在网页里帖文章。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国学”?对此,到如今还在争论,还处在被界定的过程中。而且由于各人学科背景、知识储备、观念立场的不同,对“国学”的定义便纷繁杂不一。因此在缺少一个统一的话语背景的情况下来讨论这个大问题,肯定会在很漫长的一段时间是发生错位。就是说,大家表面上使用同一个词语,但谈的其实不是同一个对象。可是现在又不可能通过哪一个权威机构来决定,然后大家遵守它的定义再讨论。我想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学术界还会继续论争,然后从论争中梳理出相对能够接受的界定,从而使问题逐步明晰。而且重要的是,围绕国学定义的论争,本身就意味着对国学的一种研讨了。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引入人类学?今天的话题从“国学与人类学”谈起,我觉得非常重要。国学和人类学,仅从字面来看,区别都非常清楚,代表两种视野和品味:一个强调国别,一个强调人类;一个看局部,一个看整体。这种最直观的差异隐含着很大的对话空间。我想一旦引入了人类学视野,国学就变成了一种地方性知识,成为一个文化区域的内部传统。但过去,当我们没有把人类学这样的参照拿进来的时候,“国学”显得像是自身圆满的,是一个能够打通古今的完整体系。那样的认识没有考虑到“国学”是有边界的——就是一国。按照过去的传统,这个一国就是世界,或者叫“天下”,所以在以往很长的时间里,国人既不关注“人类”,也不需要“边界”。如今,在全球化背景下,便有了人类学这样的框架。它至少提醒你,自己只是人类整体中的一个部分、一个分支、一个区域、一个单位。于是问题就出来了:你的一国知识能不能解决人类的问题?你的一国传统怎么样跟别国的传统相互打通?在这种结构上来讲,人类学与国学不仅有学科上对话的可能,在现实的实践层面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如何把国学这样一个自我认知的、有边界的系统跟其它系统对话。在现在许多讨论国学的文章里,大多还是只讲古今打通,忽略中外关联,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下面讲一下国学的名实之分。

“国学”作为一个名词,代表的是一种有边界的本土性话语体系与表述传统。其命名涉及到后面整个一套话语体系的意义、价值和功能。从近代演变来看,“国学”这个词有两个意义上的区分。第一是当年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中”是中国的意思。那时关注体用之辨,强调传统本位者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面对西学东渐的威胁,他们受到刺激,便要把这个被外国人、西方列强所对照出来的“民族共同体”重建为一个自我完满的体系,所以就维护本土,强调“中

学”,但这个“中学”跟固有传统已经不同。因为有了西学的参照,其便发生自我断裂,成为一种需要“他者”证明的相对话语。

顺此路径,这个本土的表述传统又进一步在现代国家的构建中由“中学”改称为“国学”,开始强调学术的国家性,就是逐渐提升此话语体系的政治地位和功能。这一点,当年的国学讲习会说得清清楚楚:“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也”(《民报》第7号)。

从人类学角度来看,这里的所谓“国学”其实是“汉学”。因为“国学”所指的“国”,从清朝到民国到如今都不是单一的民族国家,而是包含多民族共存的共同体。但“国学”所集中讨论的多半只限于以汉语表述的儒家文献。这样,其在“国”的代表性上就有了问题。最近我读到很多学者对国学的界定,认为“国学就是中华民族的学术传统”。这是不准确的。汉语经验里的儒学一家何以代表整个的多民族共同体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共同体中,仅从语言文字的话语体系与表述传统来讲,除了汉语世界的儒学外,至少还并存着藏学、满学、彝学和蒙古学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在如今各界关注国学的热潮中,我非常敬佩《光明日报》梁枢主编的一系列创举,但我觉得应当正视这是国学的“第二次复兴”,已不限于“五四”运动前后的那种“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为此,需要重新定义我们的第二次学术使命,必须面对新问题。这个新问题就是国学已经不是当时的“中学”,也不仅仅限于“汉学”,它面对的还有满学、蒙古学、藏学、彝学……(叶舒宪插话:“还有西夏学”)。对。当“国学”面对这么多传统时,该如何整合?前段舒宪和我分别发表的文章《狼图腾还是熊图腾》和《“龙传人”与“狼图腾”》,讨论的问题都与此相关。

时间有限,我这里只讲观点。国学的名实问题还与其多层的结构划分相关,包括儒释道、官士民和三重证据等。去年我参加一个与道教相关的会,提交的文章从所谓“汉学三统”谈起。我之所以使用“汉学”一名,意在强调一种“在汉地产生、以汉语表达并主要关注华夏群体的一种话语传统”。其中的三统,就是古往今来的儒、释、道三家。现在说得比较多的是儒家,但我觉得如果把道家与佛学排出于“国学”体系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利的。

所谓官、士、民的区分,意味着要注意“国学”的结构里,还存在着内部的阶层分别。其中既有由士大夫集团体现的官方意识形态,也有民间百姓体现的底层表述。用人类学术语来说,后者代表着特定文化体系中不可忽视的“小传统”,是汉学的根底。也就是说,

这个民间的小传统虽然在学界的讨论中被忽略,实际上却在生生不息地支撑着国学的根基。多年前我们在厦门开文学人类学年会,人类学家李亦园作专题演讲,认为儒学的根基在于民间仪式。他以“致中和”观念为例,指出“致中和”在儒学体系里是最核心的概念,但其在民间的现实行为里却是日常。因此若能从不同阶层的互动关联来打通的话,将有助于“国学”讨论的开放和延伸。

另外是“多重证据”问题。目前的国学讨论多限于历史文献和文字文本。这当然是重要的,但从媒介的层面,我想人类学还可提供补充和借鉴。过去,甲骨文的出土引出王国维等对“二重证据”的倡导,从而扩展了国学的资料来源。如若再把人类学强调的“口头传统”与“活态文化”添补进去的话,与此有关的研究会更为丰富、更加完整。从文本的构成上来讲,现在我们对国学的关注,还停留在书写传统的层面。其实书写与口头传统,或“口传历史”是两套体系,需要作不同的对待和处理。在现实生活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共同体成员其实不是通过书面来表述的。他们通过符号、服装、仪式,以及(包括我们今天开始争抢的“端午节”在内的)节日体系等等动态话语来相互传达和自我呈现。你能说这些不在“国学”的范围内么?

接下来再讲国学的叙事问题。这里关涉到一个身处地方性知识的传统社会,同时又面对全球化语境时的表述困境。举个例子,最近我在比较两本新近翻译引进的书:《中国形象》和《人类前史》(*China's Image & The Journey of Man*)。它们的内容、视角正好与国学和人类学相对应。前者关注中国的“和平崛起”,讨论其“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认为中国正同时面临国内外两个层面的身份危机,因而引起了翻译者们的高度重视。这可以说就与“国学”复兴相关。与此同时,后一本书则关心人类的非洲起源及其所有成员在生态与命运上的统一性问题。在我看来,二者的区别,在于“国别叙事”和“人类叙事”。在这样的语境中,怎样认知和表述“中国”,就成为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关注“国学”,面对着的时代语境是中国的“国家身份”和“形象”现在都处在变动和建设之中。我们已经没有一个统一有效的表述工具来表述这个国家、这个历史、这个文明和这个民族。那么,“国学”能否作为有效的代表呢?看来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所以我认为第二次国学复兴面临首要问题,就是新一代的“名实之辨”(或名实之争)。新一代的名和实要吻合,需要重新鉴别、梳理和命名。这是新的学术任务和学术使命。当年张之洞讲“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就连“西学”也还要细分,也就是要把“西”改为“希”,代表两希传统:古希腊和希伯来。这样才完整。也只有与完整的“希学”对话,“汉学”才可能照见自身,取长补短。除此之外,人类世界与“希伯来”关联的其他非理性传统也值得关注和对比。比如最近风靡的《达芬奇密码》、《哈里·波特》以及被称为“新时代运动”的反现代性潮流等等,都超出了古希腊一脉的表述系统,难以用以往的“西学”来概括。前些年我们在四川大学组织“原始复归与文化认同”的讨论,涉及过此类问题。在这方面,本土“国学”与域外“西学”面对的困难是共同的,都需要扩大到人类学层面来解决。

彭兆荣:因为我们待会要先走,所以就先来抢先做个发言。其实把我叫到这个地方来,我还是感觉到有点仓促。我首先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也就是国学今天被重新重视、重新讨论的必要性。恰好,梁枢兄前一段时间到厦门大学,厦门大学恢复国学院,今天我重新想起来,发现厦门大学有一个创意,不是说恢复国学院是一个创意,而是说把国学院牌子挂在人类博物馆。国学、人类学相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想,当年林惠祥先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厦门大学创立人类学科系的时候,是把人类学放在“国学”之中的,放在历史系里面,把人类学与国学放在一起。今天看起来在学理上有一些荒谬,但我们不知道林先生当时是不是有这种意图,把中国的传统学问与西方的学问进行交流、对话和打通。李亦园先生其实蛮看重厦门大学的国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传统。为什么我们今天出现这样一个话题?它有什么样的历史语境和需要,我简单梳理了一下,大致有八点:

第一,国学之所以在今天被讨论,它有一个新/旧的问题。在与“五四运动”时期的“新学”相对应,“国学”属于“旧学”。我们今天之所以“再造”国学,有一个如何看待传统的中国学问,在发展中如何看待过去的问题。当然,我们今天也不能局限于“五四”时候以新学看待旧学的眼光,因为今天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种文化需求,是在社会面临大的变革时,中国需要对自己过去的传统重新整理和选择。我们不妨把今天和“五四”进行对比。“五四”其实是一种文化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也是一种变革。这会产生一种文化上的需求,就是在今天的语境下我们再不整理国故,是不行的。当然“整理国故”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过程,它首先是一个在当代如何去面对我们的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问题。

第二,今天的国学还有一个如何面对西学的问

题,即“中/西”,却又不是当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单袭用和重复。中国今天的国学已经不“纯粹”了,自从鸦片战争国门被西方列强舰炮打开之后,中国的国学就很难再自视纯洁了。我的意思是说,就算今天被认为的许多国学大师,其实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积淀着、交织着“西学”、“洋学”的东西。季羨林被认为是国学大师,可他是个留洋归来的;曾经在厦门大学呆过的几位国学大师,顾颉刚、鲁迅、林语堂等都是留洋归来的。西学东渐以后,国学就有一个如何面对的问题。人类学当然是标准的西学,完全的西学。包括国学家在接纳西方的概念、融会西方的学理,使用西方的方法,再回来看国学,再来看传统学问,再来面对经史子集,再来看《尔雅》、《说文解字》的时候,已经完全是不一样的了,视野是不一样的了。所以,我们今天谈论国学无论如何都是回避不了西学,即便是穿着长衫的国学家,可能说的话还夹着洋话。这有点类似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东方主义首先建立“我者/他者”的关系,今天如果你谈我者而没有他者,或者讲他者而没有我者,是完全不可能的。人类学属于跨学科、跨族群、跨时空、跨文化的整合性学科,所以,今天如何通过人类学与国学的对话、交流重新梳理其中的关系也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第三,“国学”这个名词,显然是较为晚近的。1911年之前是应该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学”。国学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因为民族国家在中国是一个晚近的事情。因此,包括“五四”时期所说的“国粹”都带有很强的民族国家的国家主体意识。这个“国”不是封建时代“家国”的国,而是民族国家的国。今天以国家的形态命名的一种传统学问,这本身包含着很大的创意,同时也存在着悖论性;就像刚才新建讲的,国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那么藏学呢?还不仅是这个问题。现在世界上通行的国家表述单位就是民族国家,它是以国家的政治表述作为第一性的,其它的表述都是附属政治表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来看传统的学问,旧学问,或者是历史的学问,安了一个国学的名字,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融入国家政治的意识形态。今天我们重新命名传统学问会出现什么问题?人们自然会问:你以什么原则将过去的东西拣进来建构一个国学体系?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比如代表我们国家的民乐(民族乐器),包括二胡、琵琶等。这是纯粹中国的东西吗?胡是什么概念?如果刨根问底,今天与西洋乐器对应的国乐里面有几样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呢?都是在同一个背景下,需要与西洋乐的进行区隔,其中包含着强烈的国家政治形态的诉求。同时也会影响到对我们国学内容的分类、取舍,包括

内涵的界定。(梁枢:国学不是一个中性词,是带有浓厚保守色彩的一个词。)

第四,国学相对于现代价值。我们知道今天的社会变化很快,这种变化自然也就包含了一个文化重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一方面是传统价值消亡的时代,另一方面,也是传统价值发明的时代。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需要进行现代价值的重建。从近代以后的几次大的文化运动,都可以看到社会价值的破坏与建构,不管是捣毁孔家店也好,重新树立孔子也好。如果我们追问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为什么一段时间要树立孔子,一段时间要把孔子打成那样子,现在又把孔子重新树立儒学。就在“文革”的时候,我们不是就把古董当作“封资修”要砸掉,经过这么短的一个时期,发生这么大的态度转变,而且就是在我们眼前发生。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所发生的这一社会文化事件,也就是说,在这种剧烈的社会价值变故中间通过国学来重塑一个社会价值。这个社会价值在当代已经具有了策略性。老实说,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一定成为当代社会价值的主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试验,一种现代性试验。不管是捣毁孔家店也好,砸烂“封资修”也好,今天又把古董当宝贝也好,都在过眼烟云之间。传统的价值在不断地断裂、再造,面对这个巨大的沟壑,虽然我们这些学者希望平心静气地、纯粹地来看待学问,但国学冷了这么久为什么忽然又热了起来?那不是因为梁兄啊,梁兄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有眼光看到这个问题并实践它。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今天坐下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

第五,我们说到现代社会价值,实际上也是要寻找一种认同。我刚才看到一篇采访杜维明的文章,他就认为无论是国学、“新儒学”,在今天都是在于满足一种认同的需要,他就用 identity 这个词。identity 这个词是西方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但是现在整个西方用得非常广泛,在中国也是。identity 恰恰是研究某一个族群、某一个地缘群体、某一个方言群通过特殊的人群共同体内部的社会记忆,历史整合以达到一种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忠诚,它成为一条历史的纽带。很显然,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华民族其实是要通过国学寻找到一种认同的纽带,让中华民族找到一种共同的、可依据的东西。

第六,其实今天“新国学”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文化战略。我们看一下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一定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战略。人类学就是这样兴起的。我在想,今天国学的兴起与当年人类学之诞生有相似之处。人类学为什么产生?人类学

就适应当时工业社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需要,要了解欧洲以外的世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异文化”,在政治上、战略上进行扩张,控制殖民地。所以西方国家派了大量的学者、博物学家、传教士去研究异民族的部落文化。在这种背景之下人类学产生了。当然人类学并不是一种殖民学科,作为一门科学或学科,它是独立的。今天我们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在全世界范围建立孔子学院,这是什么意思?据我所知,许多大学都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厦门大学好像在海外建立了两所:(徐:民大也建立了)一所在泰国曼谷,另一所与德国特立尔大学合作办。为什么忽然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孔子学院?西方也一样。比如法国、加拿大,加拿大政府建立了一个“加拿大大学研究”,如果你要争取获得资助在加国学习,你回国后就要宣传加拿大。法国更是这样。都是这样的。任何一个国家,当它的政治、经济、军事水平达到了一定高度,它必须要有一种文化战略,这种文化战略是与国势相配合的、相符合的。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国学,以及海外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事件和现象,事实上是在国家默许、甚至是国家支持下的一种文化战略。在这一点上其实倒是很符合人类学的产生需要及其原理的。

第七,国学在发展过程中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了,我们如何来清理西方强制性的伦理价值,有的学者使用“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等,比如美国大片、麦当劳之类的东西。这种东西到中国以及所引导的时尚已经把中国礼仪之邦的根基冲击得七零八落,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没有一种“文化自觉”,没有自主意识去进行国故的整理和重构的话,是很危险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国学有助于对公民伦理道德的培养和教化。就像在网上所说的案例,很多家长借助国学的潮流,让孩子去读经。当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算是国学之德,至少,国学之于教育、教化是不可分开的。我们回想一下解放以来国家主导的价值对每一代人的引导和教化作用。我父亲这一辈人如果当年读英文的话,那是充满危险的事情,大家都去学俄文。今天呢?俄文算什么?是什么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的?就是一个国家需要。国家在这个国民教育上,甚至在学什么语言、学什么教材、学什么内容上都已经非常精巧地把人们的知识构造和教化打包了。

第八,谈到国学与人类学的话题,还有一个方法的问题,就是把各自的方法进行结合起来。我国传统的读经方法以及训诂学,特别在晚清的考据学、“小学”,已经形成了一套研究中国学问的方法和手段。



西方的人类学讲究田野作业、文化比较方法,现代社会人类学讲究量化与质化,考古学上所使用的科学方法,诸如碳 14 测定等都有助于对新国学研究方法上的借鉴。一批中国人类家、华裔人类学家,李济、吴文藻、费孝通、凌纯生、芮逸夫、张光直、李安宅、李亦园等,他们不仅是国学传统的守护者,也是借助西方人类学方法研究国学的实践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传统中已经渗透着国学精神、国学传统与国学方法。对这一传统的了解,我想对国学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徐杰舜:彭兄,我插一句。刚才各位谈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一方面,《哈利波特》火了,但是我们看到易中天的品三国也把人们征服了。一个是西洋文化、一个是传统文化,三国也是国学的一部分嘛!那里面有对儒家思想非常重要的诠释,他用故事的形式来讲儒家的思想。易中天和罗琳 PK 的结果,在中国的市场上,易中天可能还占上风。是他让我们的中国文化变得家喻户晓。连我儿子在澳大利亚都要买易中天的光盘带过去,他们这些搞理工科的,过去根本就不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从国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刚才各位谈的话题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国学的定义、国学的范围、国学的对象都是值得我们推敲的问题,都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人类学和国学之间没有打通,其实完全可以打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学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科学吧,无论是儒学还是别的,都是当时的科学嘛,比如经史子集,比如义理、考据、辞章,这样一套表述机制。而西方的文化是以学科的门类来表达的。那么在这种不同的文化表达背景之下,我们现在希望两者能够打通,而且完全能够打通。为什么?首先就是人类学本身在西方学科之中的地位就是一个基础学科。你说它是什么?它什么都是,它也可以什么都不是。我说人类学是一个千手观音,所有的学科都可以与它牵手,所以出现了文学人类学、音乐人类学、哲学人类学,诸如此类。化学人类学、物理人类学之类也可能会兴起,我们今天总是处在化学的包围之中,总是处在手机的包围之中,网络的包围之中,据说电脑现在还要向手机化的方向发展,人类怎么办?另外,它和国学的地位是相当的。所以它们应该打通,必须打通,在今天的这个平台上讨论国学问题,我们姑且不去讲它的定义,如果不用人类学的方法去搞的话,就剩“老”的了,就剩“五四”时代的那种东西了,就不能发展了,跟现在的文化语境之间有问题,更不能成为一种文化战略。除了这一点,无论是人类学还是国学,我很赞成梁启超原来讲

的,国学的核心是人格和道德,国学实际上包含着教你怎么做人、怎么治国,当官要怎么当,当老百姓要怎么当,是这样一种核心问题。人类学的核心问题是人性,关注的是人生和人性,这两者是完全相通的。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回到国学考据的老路上去,就一点意思也没有。国家文化战略也用不着考据,老外也看不懂考据,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是将国学当中的优秀文化因素弘扬出来,无论儒学还是道家,实际上都是一个过程。历史上是没有这样的局面的,历史上开始是百家争鸣,汉代以后变成了儒家独尊,宋明是理学,到现在,虽然还可以叫做国学,但国学也是相对西方而言的,所以二者需要打通。人类学开始关注国学,那么国学家们千万不要继续用老的一套去搞国学,那是没有出路的,一定要有新的东西,人类学就是很好的一种武器。

徐新建:我再接着彭教授的话讲。我觉得今天的对谈有很大的即兴色彩——临时遇到,触机而发。但即兴的谈话每每真实,可以引发对老问题的新思考。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视野和方法。该如何理解今天的国学热?我认为理解的前提是区分,也就是区分两个“世纪初”之间的不同。舒宪刚才讲了,在训诂和考据等技术层面,我们今天的很多文章甚至达不到前人的水准。而在我看来,最大的不同在于问题的差异和语境区别。概括地说,第二次“国学热”所面对的语境,在内部是“学术的国家化”,在外部则是“知识的全球化”。前者还引申出一个国家在自身形象与国民认同方面的思想追求和精神塑造。后者更关系到地方性知识的人类学转化,即能否和怎样将以往封闭和不同的“轴心文明”,在相互对话中演变成能够为全人类所用的资源。

对此,关于“学术的国家化”还需要思考。一方面,其或许有助于对“国家”内涵的充实,将其引向思想的层面。在经济高速发展及其连锁后果的冲击中,人们越来越质疑“国家”的含义。所谓“国家”难道就仅只是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就是 GDP,而与人们的思想、情感和信仰毫无关系么?面对这样的追问,从“国学”角度讨论本土传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另一方面,对于由此而引出的“学术国家化”趋势,令人不得不产生一些担忧。因为任何一种“地方性传统”,无论多么丰富悠久,一旦以“国”限定,就会出现边界,受到禁锢,难以体现其潜在的普世性价值。

如今,把人类学视野增加进来,便可超越以往的国学框架,把包括儒释道与藏学、满学等在内的本土传统加入到与欧美、南亚以及非洲等其他地方性话语的对话之中,并在总体的人类世界关系里,使各自的普遍价值逐一呈现,从而构建出全人类共享的知识话语。

如今,面对生态、能源等诸多危机,能否寻找到解决人类继续生存发展之问题的知识资源,我觉得人类学提供了一种更大的知识平台。在视野上它超越了“汉学”或“西学”。以此来看,我觉得今天的国学有两个使命,因为它弱势,要对抗西学的霸权,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以这个为终极目标,继续强化和复制的还是一种对抗的文明关系的话,就会有问题。因为以一个霸权的“中学”去占领未来世界,与以往的西方霸权有什么区别?从道义上讲,那还是一种重复。所以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警惕以国学取代西学,追求新的霸权。

第二,如果过分强调学术国家化,把汉学变成国学,就有可能把其中所包含的人类智慧——或“普世性精神”——地方化。刚才我们讲的儒家的这些理想,比如刚才舒宪说的,儒家培养君子而不是工具,等等,这只对中国人有用吗?再比如道家,它的许多智慧被我们称为“国宝”。其实岂止是国宝?是人类和世界的遗产。《易经》只是给中国人看的吗?《格萨尔传》只唱给中国人听么?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过多地强调汉学传统的地方性和国家边界,就有可能将此传统永远地限于雅斯贝斯所讲的“轴心地区”,将其中的本有的人类性定死在如今的“民族-国家”体系里得不到伸展。这两个危险是值得引起我们警觉的。为此,人类学的引入便有了必要。由此也可看出国学与人类学对话对于第二次“国学热”的意义所在。

梁枢:小郑,你琢磨点儿问题,在座的人中儒学或者说国学的学问你是最高的,你应该从你的国学的角度,给人类学学者提出些什么问题。

郑任钊:我们现在通常将国学定义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学术”,这个中华民族到底都包括些什么,现在我们知道包括56个民族。徐老师说国学应该叫汉学,我觉得这是有些过于窄化了。因为我们说国学是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很少数民族都参与到了创建国学的过程中去,所以也不仅仅是汉学。尽管国学现在主要是由汉语表达的,但很多古民族现在已经消失了,而且很多民族本身也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他们的民族文化也是通过汉语的文字留下来的,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国学说成是汉学。汉学这个词,是国外学者的一个称呼,像我们国内搞儒学的还是不太认同这个称呼,我们不说汉学。

国学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时代的需要。国学我只涉及一个很小很小的分支,我不敢谈什么东西。首先就是国学的名称问题,今天还是一个有疑义的问题,到底它的内涵外延是什么?现在也的确说不清楚。

按我的理解,“国学”是关于中华民族固有的知识体系的学问,它应该包括中国现有的56个民族在内,而从实际的历史看,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如蒙古族之于元朝、满族之于清朝还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既然说是“学”,就意味着不是一个民族的一切文化现象都纳入其中的,而是指民族文化中的那些精粹的、可以构成知识体系的学问。这些学问按照现代的西方学术分类,也可以分出很多门类来,比如社会科学门类、自然科学门类都可以分得出来。张岱年先生甚至认为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属于国学范围。国学本身是发展的,这个学术你不能把它截止到1911年就算完了,它还在发展。

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要将关注点过多地放在国学的名称定义问题上,关键是国学能在今天兴起,能被许多人接受和认同不是偶然的,或者说当今中国人需要国学。这是最重要的。国学为什么现在兴起?我认为这里面体现现代中国的一个时代的需要。

首先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中国在这个世界上需要一个自己的整体形象。以前我们老拿熊猫当形象,这是非常不够的。欧美国家都强调各自的民族精神,法国人强调法兰西精神,美国人强调美利坚精神,他们都以自己国家有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而自豪,我们这样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她的民族精神是什么?中国的思想家、文学家提出过什么重要的理念?有哪些伟大的作品?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历史文化创造是什么?或者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她的文化“品牌”是什么?我们要向全世界树立一个中华民族的形象,这首先是国家的需要。

还有就是个人文化修养的需要,现代中国人虽然比较注重物质生活,但也并不是整天想着票子、房子、车子,他们也经常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他们内心会追问:作为中国人,我的根在哪里?这就会引出一个新的问题,即对自己祖先的文化创造如何认知、欣赏和传承的问题。中国人的许多年轻父母,在孩子呀呀学语时就教他们背唐诗,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是一个有国学素养的人。能背几首古诗,或懂一些中国历史,也许并不能当饭吃,但这却反映一个人文化修养的问题,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的许多普通百姓都懂得这个道理。

从内涵上说,国学的主体不是考据学,我认为,国学的主体在于它的价值观,几千年来这个民族贯穿下来的价值体系,已经深入到这个民族的内心深处。但为什么今天我们一提国学就会想到文字训诂之类的问题呢?这是因为我们把几千年的传统给断裂了。所以我们今天只能从头搞起,先让孩子们开始读经,

不仅是孩子们开始读经,我们的大学也开始读经,国学院也开始读经。因为今天的大学生、研究生以前就没有接触过经典。从《论语》里随便摘出来很普通的几句让他们读一下,有可能都读不下来。在台湾,甚至在国外,比如韩国,这种传统都是没有断的,所以他们可以直接去探讨它的价值,但我们今天不行,我们还得先教基础。像以前我接触的韩国人,很多都能直接背诵《论语》,我们今天搞国学的人能把《论语》背下来的不敢说绝对没有,即使有也很少很少。所以我们今天先是从文字、读经开始。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说考据学真的就没有用了。它还是研究国学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和工具。要读懂古代文献,文字训诂考据是基本功,其研究成果也为其它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还有一点,我认为儒学本身就有一种人类学的视野,当时儒者所谓的“天下”,就是一个世界。他并不认为这个世界里的人是有本质差别的,有差别也只是文化上的差别,不是种族、地理上的差别。(梁枢:就是有教无类啊)儒家所讲的“大一统”,我们现在理解为“国家的统一”,但他们所说的“大一统”实际上是“天下”的一统,若用今天的话说,是一种全球的统一。儒家提出“大一统”是在《春秋公羊传》,我自己是研究春秋公羊学的。公羊学讲究“天下远近小大若一”,都是一样的。公羊学认为夷、夏之称无常定,如果表现出“礼仪”文明的一面,就是中国,如果表现出“野蛮”的那一面就是夷狄。中国做了不合“礼仪”的事情那就成了夷狄,而夷狄如果做了“礼仪”的事情那他就是中国。

还有一点就是我看叶老师说过“蛮夷戎狄”是一种贬称,这个我看到郑张尚芳先生说,“蛮夷戎狄”这些词都是对少数民族自称的一种音译,本身并不是一种贬称,后来指称野蛮人只是一种后起的引申说法。比如“蛮”字下面是一个“虫”,但甲骨文里面最初并没有这个“虫”字,“狄”经常也写作“翟”,也就是说刚开始就是一个译音。这些都是自称,原来自然没有贬义。而且偏旁加虫、加犬,也不一定就是贬义,也有可能是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图腾。

叶舒宪:不是译音,凡是从虫的都是贬称,比如《周礼》的“八蛮七闽”

郑仁钊:但这个虫旁可能是后加上的。

叶舒宪:闽字从虫不是后加的,蜀字的虫也不是后加的,这是体现中原民族自我中心世界观的一种文化价值编码方式,从人类学立场看得很清楚。

徐杰舜:你讲的这个问题啊,你是学历史的,我也是学历史的,三个学历史的和三个学中文的,所以我觉得比如费老先生是最正宗的人类学家,但费老的人类学研究,从《江村经济》到文化自觉,最后据说费老

将自己的学问打通之后是走向天下大同,走向国学里面去了。那么现在为什么我要请王铭铭教授来呢?因为王铭铭教授做人类学做得是很正宗的,但是他现在研究天下,他也是走到国学来了。现在你们俩要走,就听他讲讲。

叶舒宪:他(郑)说的是广义国学,似乎只要是中国人,不管做什么学问,用汉语写的,都是国学。

徐杰舜:铭铭讲讲,从你的天下观讲起。

王铭铭:中国出现国学热,对这个意义上的国学,我有点反感,以为什么东西一旦搞得像群众运动,谁都在谈,就不好了。尽管在我看来近来国学这个词变得有点不对头,但我又实在感到,这一波运动的确有其意义。我们这个国家继承的是“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这一阶段出现的新传统,这个新传统的基本号召,就是打倒“孔家店”在内的国学。20世纪初以来,中国人都是以反传统为所谓“文化建设”的目的,所以我们的“建设”常常带着严重的文化破坏性。当下国学的复兴表明,我们这个国家开始更客观地看待历史了。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的研究如何跟国学形成关系?这个问题是需要得到重视的。文史哲是传统的学问,而社会科学是西来的“新生事物”。如何在一门西来的学问里面谈国学?站在学科本位里谈国学,社会科学家多数可能对国学采取批评态度。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都是西方的,这种基于分析而非整体主义认识的概念体系,不能不对国学大谈的“道”难解风情,并且不能不因此而认定这东西毫无可以明确定义的科学认识论意义。对国学,我是外行。不过,对于社会科学如何谈国学,我兴趣盎然。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跟西学对于非分析性观念的排斥有不同看法,另一方面,我对西学的一些新变化的认识,使我确信,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西方社会科学家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社会科学进行了历史梳理,其最主要发现之一就是:社会科学的最主要概念来自于基督教。被我们认定是“科学”的东西,在时下不少西方社会科学家看来,是西方传统文化的一种近代延伸。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二字,不是真理,而是文化。这便是西方社会科学观念的新发现。这个发现,使社会科学产生了新认识。一方面,学者们更清晰地看到,将一个传统中的观念运用与另一个传统的解释中,社会科学家最易犯民族中心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多数社会科学家实际并没有把与西方文化有同等价值的观念当作“科学”过,因而,今后社会科学研究不要轻易进行“理论搬运”,而要多探索非西方传统里存在的接近于所谓“科学”的东西。

最近西方社会科学的这个新认识,不是没有自己的基础。反思西方民族中心主义的工作,人类学家做得比较早。人类学家想从第三世界的研究里面提出一些具有普遍价值的概念。到今天,人类学这门社会科学主要概念都来自于部落社会。部落社会是相对于欧洲民族国家的一种形态,其中蕴涵着不少与支撑了西方民族国家与帝国主义的基督教观念不同的观念。部落社会不强调国家,其秩序来自于非政治因素,多与仪式与生育制度相联系,制度的理论完全不同。这些东西,在西方人类学家看来,有助于改进西方文化的自我认识,所以长期得到他们的重视。不乏也有西方汉学家在探讨中国的所谓“本地概念”是否不同于西方的概念,这些中国概念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法国人类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便有企图在中国古代制度和观念的基础上探讨一种一般社会科学理论。我是做人类学研究的,学习人类学的过程中,感到这门学科里蕴藏着不少值得整体社会科学考虑的丰富想像力。除了从部落社会研究得出的概念之外,我觉得诸如葛兰言基于中国礼仪的研究提出的社会理论,也是颇有启发的。对我而言,他的工作表明,所谓“国学”中的一些因素(如礼仪和人情的观念),是有普遍解释力的。这些因素,不妨应得到社会科学家的更广泛重视,不妨可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可以探讨的资源来认识。举一些例子来说,比如说“社会”(society)这个词,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关键词,它与国学的结合,潜力颇大。这个词先是译成“群”,到了1903年改译成“社会”。当时译成“群”时,指的是一种礼仪导致的统一体。这个定义,与给予“社会”观念充分关注的法国年鉴派创始人涂尔干不谋而合。1903年以后,我们转用了日本的译法——“社会”(日本是用了唐宋以后中国存在的“社会”这两个字来翻译西方的“社会”的)。转用“社会”二字,抛弃“群”,表面上使“社会”的中国定义更贴近西学,但实际上,这个转变,使中国的社会思想丧失了原来以礼为中心的“群”的感觉。“社会”从“迎神赛会”这些民间化的仪式活动而来,缺乏了古代“群”的凝聚性和礼的制度性。采纳这个译法,与20世纪初期西方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有密切关系,这种西方主义将西方想像成没有“群”的理性个体主义。在这种个体主义意识形态下,“社会”变成了缺乏任何有机关系的个体的凑合与相互矛盾。谈社会科学时,不能不谈“社会”这两个字。可“社会”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更多指的是“需要被管理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情况”。我们对于“社会”的这种认识,来自于20世纪反传统的“文化建设”方案。如此说来,重新探讨“社会”的结合力,成为中国社会

科学的新任务。在这方面,国学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在我看来,古代中国的礼仪里存在着丰富的社会理论思想,其深刻程度,绝对不低于从基督教传统里衍生出来的社会科学。古代礼仪理论一方面谈欲望,另一方面谈控制欲望。荀子是这个谈法的代表人物。古人说,礼仪要表达和养育人情。什么叫做“人情”?西文基本上是不可翻译的。“人情”的理论是中国特有的,对中国社会有解释力,这不会遭到太多怀疑,但这个观念是否有人类学意义上的普遍解释力?中国社会科学家要多探讨。中国社会科学要有自己的基础,要有一定的自尊心,肯定是要参考国学的。中国社会科学也要借此反思20世纪自己犯的错误,特别是广义的“文化极端化”错误。20世纪中国发生不少灾难,它们来自何处?有新儒家认为主要来自“文化极端化”。这个反思性的看法,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应有更多启发。

当西方社会科学家开始反省自身时,中国社会科学家多数抱着他们抛弃的东西不放。这个差异,使人感到遗憾。国学对于改变中国社会科学西方主义现状应起重要作用。

然而,如此谈国学,会给人一种印象——我们在宣扬一种华夏民族中心主义。的确,国学家若是将自己仅限于“国”这个字,那就很危险了。国学是在大地上、天地间的思想资源,一旦用“国”字就带有西方的现代性。在古代中国,“国”字本来指的是地区,在中国地位向来很低。古代中国的思想,与西方思想一样,是以普遍关怀为前提的。所以,国学家应当有更世界化的关怀,社会科学家谈国学,也不应以建立文化意义上的“国”为目的,而应有更宽阔的视野与广泛的关怀。若国学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而不是一种世界性的概念体系,那它的意义就不大了。

叶舒宪:儒家的“有教无类”只是针对受教育者社会地位而说的;还有针对族群划分而说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还有“尊王攘夷”,整个《春秋》学就是围绕这个来的。

梁枢:彭兄趁着你没走我问你个问题。因为这几年你一直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操作层面讲和今天的人类学是不是一种链接?它的眼光和理念是什么?什么东西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应该是有一个标准,是否渗透着有这两种东西?

彭兆荣:事实上我这几天在北京就是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草案。说起来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国学热”有相似之处,它也像是一个运动,始作俑者不是我们国家,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真正进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是非常晚近的事情,直到现在还在讨论和实践中。它与1972年联合国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有关。无论是文化遗产还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与人类学有关系,因为当时只划分“文化/自然”遗产两大类;当时联合国在评审各缔约国选送的代表作的专家组成员中主要来自两大学科类,一个是人学,负责文化这一块;另一个是地学,负责自然遗产。人学不仅仅是人类学、民族学、生态学,还有历史学、美学等。地学则包括地理学、地质学、地矿学、地貌学等等。所以我们在联合国早先所有与文化遗产有关系的评选标准条文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学这一学科的身影。后来,随着发展就发现还有很大一块遗失了,就是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于是增加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又改了,去掉了“口头”一词而统称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它之下又分成五个部分:实践、表现、表述、知识和技能。

叶舒宪:这个来源是以芬兰民间文学家叫劳里·杭柯为主的专家组。杭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专家期间,针对物质的、有形的文化遗产,专门提出一个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口传与非物质遗产),这个词组就是这样来的。以他的学科背景,把民间文学看成是民俗学、人类学的一个下属的话,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名目就与人类学密切相关。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有清理的必要。因为我们以前的国学研究是根本没有包含这些的。什么春节啊,端午习俗啊,口头传说和民间小曲的,哪里是精英知识人考虑的呢?文化人类学的眼光则完全是向下的,其研究特别强调 oral,因为这个学科一开始就是研究所谓原始社会的。文字是社会权力建立霸权统治的有力手段。但是人类学的问题在于:没有文字的社会和人有没有文化?如果有,又表现在哪里?原来就在 oral 和民间礼仪和生活里面。这个概念从联合国保护文化遗产的专家那里提出来,意义重大。我国的学院派却反其道而行,在学科调整中把民间文学取消了。大学中文系里现在剩下的民间文学教研室已是凤毛麟角,合并到民俗学里了,民俗学被划归到社会学。所以,为了适应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现实需求,有个别学校捷足先登,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如西北大学),他们不知道本应对接到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这里。

徐杰舜:但是把国学回到它的根源上无论是《诗经》,还是《论语》都是从民间草根出来的。

徐新建:遗产有一个标准,就是它主要针对于濒危的或弱势的,理论上它没有明确讲,它没有把强势的大传统包括进来,比如基督教。

彭兆荣:现在已经变化了。这是一个很好切合到

国学与人类学结合的东西。我们讲《论语》,它只是一个语体,根本不是经典文字,我们现在把它当作经典文字,《论语》其实就是上课讲话。

(中间休息)

梁枢:王铭铭刚才谈到国学对他的研究有价值,能不能具体谈谈哪些东西入了你的法眼?哪些引起你的兴趣。我看了看国学版去年发了20多期,绝大部分文章阐述当代国学价值,什么企业管理里面的国学啊、什么立家的道德教育啊,从各个侧面还有学理上论述国学的当代价值。那么到底是怎么研究国学?这方面的文章发的比较少。然后还有一块是国学有什么?这是小郑帮着写呢,开了一个“乾元国学百科”,经史子集分别介绍。还有一个怎么学国学?这个也比较少。怎么研究国学,下一步应该是转到这来。今天的内容作为一个开门的东西。多谈一些这方面的东西,彭兄谈得好像原则性的东西多一些,形而上的东西多了一些。

徐杰舜:我为什么一定要请王教授过来呢?因为王教授现在研究的定位是历史人类学。实际上历史人类学就是回到国学的文献,也就是王教授自己讲的国学的很多东西要入他的法眼。我非常欣赏非常赞成这点。刚才我们讲,为什么不赞成用“国学”,因为国家是民族国家,这是西方的话语,我们中国古代是不讲国家的,只讲“天下”。我在前年请王铭铭教授到南宁做访问,他谈了天下观的问题,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启发。我自己也是学历史出身的,我有很多东西做着做着就做到历史里面去了。现在我们讲人类学关注或者人类学视野中的国学,或者是人类学视野中的儒家思想,很多东西是和人类学相通的。儒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包括梁启超都强调的一点是人格,做人的道理。《论语》就是老师上课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读书,怎么交朋友,怎么和别人沟通,用现在的话语讲就是这么一回事。你信不信神,我们干嘛要信神,我们自己做人还没做够,我们干嘛要去信那些神?就是这样一些道理。《诗经》就不用说了,《诗经》就是当时的情歌,为什么有那么多情歌,食、色是人的天性,那你现在讲《诗经》不都是黄色文化了?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还得了?但这还是经典,已经被刻板化了,刻板化了就是经典,诸子百家从夏、商、周三代到战国,1800年,我们中国的话语体系,到后来就是“天下”,近现代的东西是近100年才出现的。所以现在我们人类学关注的儒学怎么教你做人,还有人本是善的还是人本是恶的,你的欲望有一个

“本我”、“自我”、“超我”的问题,如果全是“本我”那还得了?所以你必须控制你的欲望,所以人类学也强调你的文化问题,从小到大你都得学习,这就是文化濡化问题,还要考虑你的人格健康不健康,发挥你的最佳作用,这都是人类学的一些命题,包括你的生存策略,包括你的家庭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人类学的视野看待国学,把国学和现代的文化背景、现代的政治需要结合起来。为什么政治需要,你现在拿什么东西来统一我们中国人民的思想?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是当权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你不能再拿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来搞了,那么我刚刚也提到西方所有的思潮所有的文化都在我们这里展演过了,萨特也好,那不是很流行么,存在就是合理的。我觉得人类学有很多西方文化的表达,从文化进化论开始,认为文化是进化的,文化是传播的,文化是功能的,文化是结构的,一直到文化是解释的,文化是象征的,这些都是西方的文化表达。但是到我们中国来,我们的文化表达是儒家形象,“温、良、恭、俭、让”,是君子,是“和为贵”。现在“和”文化太有用了,因为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只有在我们这里能找到,如果人类学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文化表达,一直到现在解释人类学与象征人类学是合在一起的。格尔茨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都很流行,但是要啃他的书,难啃得要命,我们外语不好,看翻译本,如果翻译本不好的话,我们就死定了。但是我们读自己的东西就会感觉不同,所以我说人类学怎么样来研究国学?或者怎么样给国学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形象?现在中央提的“以人为本”,那不是我们人类学的根本价值取向么?“科学发展观”叶舒宪先生在银川会议上特别强调这样的发展不行,发表了《人类学质疑科学发展观》。当时争论的焦点是发展还是不发展,后来中央提出了一个“科学发展观”的理念,这样还好一点,不然环境都破坏完了,都搞假了,都搞毒了。“和谐社会”也是我们人类学所强调的,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两者能打通,应该打通,必须打通,完全能够打通,同时如果用人类学研究国学的话,国学就会有新的面貌。所以我讲任何一个学科,包括国学在内,和人类学牵手,一定会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定可以另辟蹊径,一定会有创新。对于人类学我还是小学生,他(王铭铭)是我的老师啊!在北京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讲习班里,他当了我三年的班主任。他教的东西很有用,做人有用,做事有用,做事就有洞察力,有应用能力,做学问当然也是好玩得很。

叶舒宪:我接着你的话题讲,呆会儿王兄再补充。国学和人类学结合,我刚才听了各位的,好像不是在

知识学术的意义上谈,而在当今文化的大背景下谈。如果在文化大背景下谈,我们可以把国学、人类学相通之处从三个方面来看,前面我说了两个方面(人类学的中国话语,国学的人类学视野),现在补充第三方面:人类学能够启发本土文化的自觉,这实际上是讲“国学为什么要复兴”(或者叫“国学何为”)的问题。刚才王兄讲到我们的文化革命,整个20世纪就是自我摧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就因为对本土文化失去信心,当初的口号是“自强保种”,国人认为本民族的这个种都难以为继了,只有靠外来的西学,才能够拯救民族国家。后来就是什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这些话语都是一个模式,就是西方那边有救命良药,本土文化这边存活不下去了。在这个背景下,把本土文化看成是落后的、封建的,认为之所以落后挨打就是因为有孔孟,这就归咎错了。

郑仁钊: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种保下来有什么用?

叶舒宪:20世纪基本上延续下来的就是这种反复的文化自虐。毛泽东虽然国学不错,床头都是线装书,但他的思维也是延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来的,所以后来针对传统搞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改革开放以后,另一代领导和国学传统也是隔膜的,大都是清华的或留洋的,学的都是西方那一套。靠西方那一套知识治理国家,初衷是强国,但实际上对本土文化的杀伤力很大。王兄刚才说国学热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客观地研究本土文化,但我看客观是做不到的,它至少可以启发人们看到自己文化的东西还是宝贝。“文革”的时候那些跳大神的,跳傩的都是反革命。2005年江西省政府拿出一千万元来举办傩文化艺术周,要恢复傩文化。当时请来一位韩国傩师(女巫),当众表演了上刀梯。她在韩国被奉为国家功勋,而在我们这儿就是现行反革命。在对自己文化的态度上,中韩反差太强烈了。因为我们照搬来一个西方的科学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而跳神演傩显然是跟科学相反的。今天情况变了。从全球化背景看,每一种本土文化都是一种珍贵的资源。按照《帝国》一书的两位作者所讲,20世纪后期世界经济主流开始从物质经济转向非物质经济。什么叫非物质经济,就是不再单靠挖石油、挖煤、生产汽车来竞争国力了。靠什么?靠挖掘文化资源。刚才讲的《哈利·波特》,就是发掘本土文化资源打造的一个成功品牌。(非物质经济)也可以更简洁地称为“符号经济”。靠文化含量来生产利润,既不耗费自然资源,也不污染环境,而且文化资源本身,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用亨廷顿的说法,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是有冲突的。如果每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都认为是废的,是坏的,那就是根本没有



文化自觉,正需要人类学思想的启蒙。人类学首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文化相对论:每一种文化都有独特的价值,彼此之间没有优劣高下。你西方文化只是人类千千万万种文化中的一种而已,怎么能够统一其他文化呢?在物质层面也许能做到,但是在生活、价值和习俗方面做不到。假如做到了也会是灾难。每个民族都按照西方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标准来衡量其先进与落后,以及是优是劣,这是不对的。哪怕是如今还处在刀耕火种的民族文化,她对未来的人类也是一面镜子。她是怎么历经沧桑而存活下来的,她为什么能够战胜疾病战胜灾荒,没有 SARS 没有艾滋病?这实际上对我们现代人教育太大了。她不耗资源,在环境中能够适应下来,这实际上都是最宝贵的可持续生存经验。所以人类学树立起的文化多样性的镜子,对每一个民族自己的文化有反观的作用。不要把西方的技术作为惟一的导向。这样的话,每一个民族才有自己的文化自觉。咱们的国学虽热,却不能说是文化自觉的智慧结果,而是被逼的。至少是自然资源走向枯竭的情况下不得已的。2006年中国的石油进口已经排在世界前几位了。有些自然资源眼看着就没有了,而土地却以惊人速度沙漠化,去年北京城的沙尘暴大家都经历了。靠有限的自然资源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自掘坟墓,还怎么可持续发展,往哪里发展?油都用完了,能到月球上去持续么?怎么办呢?所谓科学发展就是要扭转单纯耗费自然资源的发展。逐步抛弃旧工业的模式,在国外叫“转移别国经济学”,包括生产汽车、生产家电和电脑这都是人家要淘汰要转移的。替代旧的制造业而勃然兴起的是符号经济,我们也叫文化创意产业。日本主要是动漫产业,美国一个是好莱坞,一个是迪斯尼。香港好容易从老牌帝国英国统治下回归了,争取了一百年,却又让新的文化帝国美国进来了:建一个东方的迪斯尼在那里。所有的主流媒体都跟着说好,让我们的几亿少年儿童心向往之。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国的文化到哪里去了?背靠着13亿人的大市场,香港迪斯尼可以说是跨国资本的文化战略的胜利,也是炎黄子孙的新耻辱。实际上还是本土文化的一种悲哀。高层领导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人类学的多元文化视野是知识上的一种真正的民主。他不看你的来头有多大,技术有多高,只要在这个世界上存活着的文化就是奇迹。恐龙都灭了你还能活着,你的文化一定有伟大之处。但是这背后的道理(文化的可持续之道)过去没有哪一个学科去关注。受西化教育的人,对那些乡土社会的下里巴人,要扫他们的盲,要灭他们的文化,要把他现代化。这完全是一种帝国式的思维。人

类学最重要的是启发民族文化的自觉。那么从国学的意义上讲,咱们就算56个民族,过去的国学哪能包含得下呢?所以这56个民族文化的自觉如果变成国家的学术,可以为这个世界提供多少生存智慧。20世纪以来西方有识之士包括许多汉学家,非常关注中国文化经验。刚才提到的张光直(前任哈佛大学华裔人类学教授),就提出中国的历史脉络的特殊性意义。如果能研究出东西来,就能在西方的和印度的历史模式之外提出一个第三种模式来,它不能完全套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阶段框架。中国传统独特的文化整合经验太不得了。它是几大文明中惟一没有中断,今天还在传承的。我们虽然说文化断根了,但是华人的“雪球”还是在滚大,甚至在全球范围滚。这个文明存活了几千年,其文化经验应该是最宝贵的。相对于世界几大文明古国来说,中国的生态是比较差的。因为黄土高原只能生产耐干旱的作物,为什么古代政权叫“社稷”?“社”和“稷”用在一起,就指小米,那是不下雨、不浇水照样能长的农作物!在这个较差的黄土高原自然环境下,我们这个文化存活了这么长时间,从人类学视野看,应该是人类最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当然不是我们传统国学讲的读经、读历史书能提出的问题。从人类学角度看国学,把这种深刻的文化经验挖掘出来应该对世界的未来贡献很大。美国汉学家柯文写了一本书《在中国发现历史》。人类学界有一本名著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民族》。两书的共同挑战是:不再用西方历史模式来看待非西方的历史。我们学的历史被分为古代、近代,都是按照西方的界标来划分的,甚至用几世纪为界标来写中国思想史。这种说法做法本身都是值得商榷的。如果要在能够找到自己的历史,就像张光直说的,那对未来世界的智慧贡献是可想而知的。这些内容算不算国学?可以讨论,但过去是不算的。

传统国学是以读经为主的。回到经书的层面上,用人类学的观点看,那些经书基本上都还是“矿”,还没有挖掘。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诗经》、《楚辞》、《中庸》、《说文解字》、《老子》、《庄子》、《史记》、《山海经》等,把这些先秦(个别汉代)的重要的典籍都用人类学的方法过一遍。人类学如果落实不到原典的解释上就容易架空。我现在培养的研究生,基本上都让他们回到国学上,做国学的题目,我们是比较文学专业,侧重中国文学和人类学的知识结合。在博士论文选题上,让国学基础薄弱的去做《尔雅》,有补课的意义。《尔雅》也是十三经之一,为什么一部字典也算经?这是有充分国学特色的人类学问题,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仪礼的问题。我

有两个学生在做《仪礼》和《礼记》，有位黄悦做《淮南子》，里面神话比较多。还有一位做《穆天子传》。一位博士后做的是《春秋》，中国最早的一部史书，号称是孔子所作，实际上树立了中国历代王家正统意识的这么一部经。古代认为六经都是史，史的根源就来自孔子的春秋大义。《春秋》表层叙述的是当时国家发生的事件，实质是要讲一个尊王攘夷的王朝正统。汉武帝以后树立起来的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就是由以《春秋》为主的解经学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我们希望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重新看待正统儒家是怎样被建构出来的。其实最初也是跟口传文化密切相关，包括我们讲的《论语》，基本上是不书写的。“论”、“语”都从“言”字，什么“子曰诗云”都是指言说的，因而根源就在上古的口传文化。虽然在学院派这里断了根，但是民间的口传文化太丰富了。倡导国学的人，如果有一些人类学的训练，绝对不会只拿着书本的经去念。甘肃的莲花山，每年六月六，方圆几百里的人，数万人在那里彻夜对歌，实际上就是现在还活着的《诗经》国风。老百姓背着干粮，走几百里路，跑到这山上干嘛？已婚妇女不是跟丈夫来，是自己来进行男女对唱，实际上这就是国风活的形态，这是古文化的宝贵活化石。我们文学课上常讨论中国有没有史诗？完全是纸上谈兵。希腊有荷马，我们好像没有。可就在甘肃夏河县，2005年我们走访一位藏族艺人，小学都没毕业的，讲唱《格萨尔》能达到两千多个小时。当地广播电台想录下来，录音带都显得不够用了。中国有史诗没有？不但有，而且篇幅是荷马史诗的一百倍。而且还活着，还能讲唱。这些艺人就是活着的荷马。国学不包括这些人，因为既非汉族，也非经史子集。我们既然是多民族国家，这都是国学应该考虑的问题。再到甘肃的礼县，秦人的发祥地，即原来给周人养马的地方。从人类学观点看是国学资源的宝库。秦国二十几年就灭了，它的历史由谁写，司马迁写的，也就是由战胜者一方书写的。这能可靠么？实际上秦的历史被埋藏了，到哪里去看？甘肃礼县、西和县。现在的七夕节怎么过，从农历六月三十开始，七天七夜的妇女节庆。看了这个民俗节日，你就容易理解牛郎织女神话为什么以女性为主角，为什么是织女主动渡河去会牛郎，而牛郎则没有主动性。当地的乞巧节全然是妇女的节日。七夕的来源也许和秦文化相关。秦国有条河流叫西汉水，有学者认为天河（天汉）就是以地上的西汉水为原型的。如今我们这么多大学里成千上万的文科师生，有谁知道陇南山区里保留着如此深厚的人文传统资源？一整代城市青年已经被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彻底征服了。有多少人还要过七

夕？从秦公大墓里面挖出金的饰器，全被贩到法国巴黎的吉美博物馆里，现在才重视起来，有甘肃和北京大学组成的考古队在那里挖，仅一个大房子就有125米长，公元前6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前数百年，秦的先人在那里营造的辉煌文化传统，史书上没有多少文字记载。这是国学不是？靠什么去认识？靠人类学和考古学重新发现这段失落的历史。新的国学在我看来不能走尊孔读经的旧路，而是要从创新视野上去重新认识本土文化，在知识上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古人那时候没有考古这些东西。地下出土的东西也不受重视。秦公大墓出来的文物，金的都流失国外，留下的主要是铜的和陶的。为什么？失落了，这和当年敦煌是一样的。先要外国人来发现其文化价值，然后我们才知道在表面贫瘠的边地还藏有历史文化珍宝！去年我们到甘肃榆中县调研，那也是扶贫的地方，按GDP标准看不会有人注意，但是当地就跟伊拉克一样，只要往地下挖就有东西出来。一时间有些村子几乎“全民皆挖”，文物贩子们开着车拿着钞票紧跟着收购。随便一个彩陶罐子就是五千年前的东西。历史书都没有记载，那都是汉字出现前古羌人文化史的见证。你们去看看会非常震惊。过去的国学讲这个么？国学如果按照多数人的理解定在书本和经学上，就成问题。用人类学的视野看，国学是一个广阔的文化空间——必须结合万卷书万里路。当下最重要的是从制度层面，从教育制度层面，把这些新知识的探索合法化。因为西化的文科教育制度缺乏“万里路”的层面，闭门造车的学院派只善于架空高论，很多都是伪学术。我们中文专业的一说到下面去，就会有人说，不务正业。而实际上文化传统失落在民间，很多都在下面，没有得到重视。学院里面建构的东西基本上是从外国搬来的老模式，包括文学史、文艺学概论，美学什么的，多年重复生产，创新极难，却拥挤着大批教授专家和与日俱增的博士硕士。希望复兴中的国学能够吸取教训，开创新局面。

梁枢：你这也是遵从孔子的教导学在四夷么？

徐杰舜：让我们铭铭总结一下。

王铭铭：社会科学家如何研究国学？如何从国学中获得思想资源？在研究国学中，社会科学家不应局限于“发现矿藏”，而应试着从中找到一些历史的启发，对我们理解今天给予刺激。

怎么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可以先从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出发。古代中国逐渐形成由皇权、绅权和民权（民间文化）三位一体格局。19世纪末以后，直到1920年，思想界仍有人坚持认为要保留这个三元一体格局。可是，20世纪，破除皇权，排斥君主立宪

制,对绅士产生失望,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三位一体格局很快成为我们的斗争对象。我们对自己的历史产生一种误解,认为“过去”都是坏的,只有西方提供的“今天”才是好的。所以,只要跟我们想像的西方不一样的皇权、绅权都不对。然而,事实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仍是巨大的。他们在对皇权与士大夫自身产生失望之后,背叛了古代中国的“雅文化”,以为通过挖掘民权的民间文化宝库,像当时北京大学的顾颉刚们那样搞“歌谣运动”,就可以救中国了。皇权和绅权的覆灭,使20世纪上半叶只留下民权与民间文化。政治家与知识分子又如何定位自身?他们成了民权的代言人。接着,历史又产生了重大变革,20世纪下半叶,政治家与知识分子多数开始怀疑民间文化带有“封建色彩”,有皇权与绅权的因素,于是又开始了批斗“封建迷信”的种种运动。对于自身历史的不宽容,导致了种种社会改造计划,塑造“新人”运动,从“土地改革”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都以消灭过去的制度与文化为目的。民间文化在这个过程中遭到了严重破坏。这样一来,到20世纪末,在中国的大文化景观上,三位一体中的“三位”都基本消失了。于是,现在谈国学,给人一种空对空的胡吹之感。将国学等同于国学的诸如儒学这样一个很局部的东西,恐怕是因为以上所说的三位一体格局完全零碎化了。幸而,三位一体的前两位,易于随着政治变迁而被彻底否定,但民间文化“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且,其中三元一体的感觉还是有的。若说人类学或者社会科学对国学有什么继承的话,从民间来看三元一体(而不仅是看民间),便是一个重要题目。在过去的一些年中,我做了一些研究,兴许可以说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这种目的。对于如何研究国学的社会理论传统,以往人们想得比较少。这些年来,在文化的研究中,我深感上述所说的三位一体对于认识传统中国及其断裂性变异的重要意义。

比较全面地了解所谓“天地之间的思想资源”,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西学的局限性,为中国在世界社会科学建立自己的地位、作出自己的贡献,都会有重大意义。关于国学可能使我们“旁观”到的西学局限性,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首先,是关于定式化的社会与流动的人群之问题,借助国学,我简单用“游”与“居”两个字来形容。道家的游和儒家的居,从两个方面定义了人的身体和思想的定位。身体与思想的流动与栖居,是道家与儒家强调的两种不同方面。倘若我们都是儒家,那就只会强调“居”,倘若我们都是道家,那就只会反之强调“游”,可是,国学的整体是同时包含这两种传统的,而我深信,社会科学家要借助国学,只

有两者并重,才可能造就一种对世界社会科学有贡献的理论。20世纪以来,除了反传统的种种运动之外,多数对传统抱有怀旧之心的学者,都将自己的思想追溯到儒家的“居”。在社会科学领域,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是这一学术态度的典范表现。侧重中国文化的一方面,恐怕有其意义——比如,可以表明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决定性结构如何看待。然而,要全面理解传统中国,除了全面了解上述所说的三位一体之外,同样也需要了解古代中国同时存在的“游”与“居”结合的结构。关于“居”,近代西方社会科学也很有想法,说近一些,思想家 Karl Polanyi 借 habitation 对资本主义的自由流动进行的反思性研究,便是一个好例子。可是,西方社会科学家不同于中国思想的地方是,他们往往企图将“居”这一元素当作是传统社会的所有元素的综合。西方社会科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又导致西方人易于在“居”与“游”之间作进化时间的联系,认为前者是历史,后者是现实,前者是传统,后者是现代。“现代化”、“全球化”等等概念的提出,与西方社会科学的二分世界观有密切关系。这种二分世界观也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对中国历史的思考,使我们形成一种分工,有些人研究传统社会的“居”,有些人研究现代社会的“游”。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家忽略了我们同其他国家最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居”与“游”的结合结构。深入的研究可以表明,没有一个社会不是这两种元素的结合,强调其中一个元素,往往与特殊时代的特殊政治风尚有关。

我要强调的是,西方社会科学最近发现了“游”这个字,所以“migration”这个词在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过去的西方社会科学,是根据国家的概念来想像社会的,若我们可以将这种社会的想像方式叫做“居”的理论,那么,它的概念之构成,核心的要点是国家的疆界,它的核心人物,是被固定在这个疆界内的人物。过去20年来,“全球化”这个概念出现,所有的西方学者似乎全都开始研究人与物的流动。这也大大影响了国内社会科学。我对这种知识的现状深感不满,我认为,这种浅薄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衍生,居然被看作是“理论”,实在可笑。流动这个东西,跨社会的交往,自古有之,而且原始社会最没有疆界。西方社会科学为什么只有在过去10年才发现“游”的重要呢?是因为他没有道家传统,没有逍遥、游离的概念。西方社会科学建立在精神和物质二分的人文观念上,将“游”归于梦,将“居”归于生活。对它而言,生活中身体与思想的“游”与“居”的双重结合,是不可想像的,只有到历史完全被摧毁之

后才可能。

在一个有着“游”与“居”结合的丰富思想世界中,展开对于社会科学的反思,能获得不少收获。如何借助国学中儒家和道家的传统来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对世界社会科学的独到贡献?围绕着“游”与“居”,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与这项工作密切相关在一起的,有哲学层次的比较。西方哲学的基础是一种“分一为二”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也深刻影响了西方哲学对于人自身的理解。西方哲学有主客之分,社会科学则有个体与社会之分,无论是哲学,还是社会科学,都耗费大量精力在寻找二分之后的“二”之间如何得到连接。这个世界观和社会观的基础,是人-物二分的观点。对于西方学者而言,难以想像人与物可以完美结合,他们有的是 humanbeings(人)、individuals(个人)、societies(社会)等种种形容人的世界的概念,与 things 这种形容物的概念。而中国人有“人物”这个词,翻译为西文只剩“人”字。这个难译之处,恰好表露出“人物”概念的文化特殊性。在这个概念中,人自身和世界万物相互辉映的人,乃是“人物”,是有一定重要性的人。而“物”又是什么?古人说,指的是“五色牛”,也就是象征世界之大的“牛”。人物、物这些中国概念,还没有得到国学家的细致研究,而其社会科学意义必将逐渐得到重视。

叶舒宪:西方主客根本就没有分,何谈合?

西方社会科学近期一直努力着试图打破主客之分、个体社会之分,其提出的 agency(能动性)等概念,便是为了反思自身的“分一为二”的学术思想传统。

而古代中国思想“合二为一”,这种混融的世界观,对于社会科学的再认识,意义是重大的。

梁枢:今天给我收获最大的就是看到了一条通道,就是说国学,我因为主持国学版,对人类学没有话语权。国学想要在 21 世纪有一种新的存在,要发扬光大,中国人重新接受,同时获得一个普适性的东西,那么怎么能得到这个东西,今天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人类学是获得两方面认同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国学语言转化成人类学语言更容易被接受,更容易吸收新的东西。因为人类学的东西就是西方的,但是它本身又是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如果让国学直接跟西方对话,还是不能够被理解。因为纯粹搞国学就不能转化成人家听得懂的东西。它要想转化过来,就得先转化成人人类学语言。然后跟人家对话,才能被吸收。但是像王老师说的需要大量的艰苦的工作。所以需要今天的学者踏踏实实地研究,真正把国学的普世性价

值彰显出来。

徐杰舜:我再说一点,因为一开始主题就是我们人类学家关注国学,实际上可以用几个关键词串联起来,一个是人类学和国学是可以打通的,必须打通,完全可以打通。第二个是国学和人类学是互动的。叶舒宪早就进入到国学里面去了,要把所有国学的经典用人类学的理论去阐释一遍,他自己来不及做的,就让他学生去做。王教授也早就走进国学去了,他关注的问题,就是他刚才讲的人和物也好,人物也好,游也好,居也好,天下也好,所以人类学要真正把中国思想的世界意义阐述出来,一定要走到国学里面去,如果离开这个根,那就不是中国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对世界文化格局的贡献就是国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就是互动。你们都在互动,我的互动可能不同一点,但是我也是走到国学里面去了,我写的《汉民族发展史》也好,《汉族风俗史》也好,都是走到国学里面去了。所以我觉得人类学与国学是可以互动的。人类学和国学在这种打通、互动中都能得到升华。我们现在这个国学绝对没有讲要泥古、要复古,要维持原来的状态,如果国学维持了原来的状态,回到“五四”那个和传统的斗争和争论当中去,那么这次的崛起是失败的。因为中国的崛起是要强调自己是文化的崛起,要用文化来和世界对话,只有拿起国学这个武器。

另外,人类学对国学的贡献有两个,一个是它的工具作用,把国学转化成老百姓通俗的语言,你如果是《周易》的话有多少人能够看懂啊?叶兄现在让学生做《尔雅》,《尔雅》多难读啊。要把它转化成现代化的语言就要人类学的理论,把人类学作为工具去转化,这种转化就是对它的贡献。第二是方法论,刚才叶教授讲过很多的,人类学的很多方法就是你必须眼睛向下,你必须做田野,文献也是田野。现在国学要提升,要升华一定要与民间文化结合,与考古文化结合,或者说跟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还得和我们社会生活结合。老百姓觉得跟自己相关的他才关注你,跟自己不相关的鬼才理你,用湖北话来说就是:“鬼的妈妈才理你。”还有和我们的人格健康相结合。如果不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那你这个国学就是回到 100 年以前那种状态去了,那不行。所以国学要发展,要上新台阶。当然纯粹的回归是没有的,我们就是要把中国思想的世界意义阐释出来。

(录音整理:黄悦)

【责任编辑:韦国友】